

■ 近现代学人与海南



何琦教授

1957年,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首次考察海南,行程非常紧凑,汽车跑过2700公里路、12个县;在海南时间总共13天,竺可桢却花了1天多的时间去见了一个人——海南疟疾防治研究站站长何琦教授。在1天多的时间里,竺可桢电话邀请何琦面谈,详细了解其工作内容;专门考察了其创办的海南疟疾防治研究站;还请何琦陪同一起参观五公祠和苏公祠。

为什么竺可桢如此重视何琦?因为后者是一位真正传奇的科学家。

他生于封建官僚家庭,没有选择经天纬地的专业,却选择了研究蚊蝇;毕业于名牌大学、就业于大都市,却率先深入海南中部山区研究疟疾,揭开“烟瘴”的神秘面纱;留学英伦、学有所成,却拒绝了导师和异国美女的双重挽留,毅然返回报效祖国,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抗美援朝、战事突起,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奔赴朝鲜;从朝鲜回国,谢绝留在繁华的大都市,为民生、为理想,拯救百万百姓出疟魔深渊……

传奇科学家何琦报国为民
伺弄蚊蝇 抗疟一生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拳拳报国志

“父亲对祖国的热爱,体现在他的人生轨迹中。”何琦的独生女何燕生说。1938年,何琦从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英国伦敦历史博物馆和导师派登教授都盛情挽留他留下来工作,房东的女儿玛丽、一位美丽的英国少女,也深情挽留他。英国先进的试验设备和条件,生活也是优裕的,但千疮百孔的祖国百废待兴。

“父亲婉谢了这些美意,因为日本侵华,祖国处处生灵涂炭,他认为自己应早日回来为祖国服务。”何燕生说。当何琦从英国回国时,北平已经沦陷。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邀请何琦回去工作,何琦不愿在沦陷区工作,婉拒了,先后到江西、重庆、四川等地工作。

何琦满怀的拳拳报国之志,始终不渝。

朝鲜战争爆发后,何琦成为最早赴朝的两位专家之一。

据何燕生转述,在何琦的自传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那是1952年2月9日,何琦突然接到东北军区卫生部打来长途电话,通知他在接到通知的4小时内前往沈阳报到。到沈阳后才知道是前往朝鲜。何琦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关系着战争的胜利,关系着祖国的安危。他当即表示:“为祖国、为人民,决不推辞。”

由于何琦在防止疟疾方面的成绩,1963年6月中央卫生部讨论、起草、制定疟疾的五年防治规划,他被任命为组长。通过这次会议,确定了以消灭疟疾作为我国抗疟规划的基本方针:制定了《全国消灭疟疾规划(草案)》,制定了《防治疟疾技术方案(试行)》,并安排和汇总了全国各省市承担的疟疾科研项目。

殷殷为民情

1952年,组织上调何琦回北京的医学科学院工作,他却

拒绝留在繁华都市,提出去疟疾严重的海南去研治疟疾。

“父亲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何燕生解释说,当时何琦的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疟疾是我国为害广大农村必须及早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但当时对此的了解和重视还不够。二是海南岛地区疟疾严重,因素最复杂。把海南岛疟疾先了解清楚,获得解决,我国其他地区疟疾就容易了解,容易解决了。

这是何琦殷殷为民之情的一个缩影。

“父亲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何燕生介绍说,何琦的祖父曾在辛亥革命后任县长等职务。1927年,何琦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那时距中国社会废除封建科举制度仅二十余年,“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观念,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知识阶层的心目中。

何燕生说,何琦却选择了大家认为比较偏门的学科,主要研究蚊、蝇、蠓、蚋、虻等双翅目昆虫,在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中,它们既没有牛羊等家畜的经济价值;也没有古生物化石等窥探生命进化的理论意义。在世人看来,蚊蝇不过是一些惹人生厌的虫子,研究它们似乎是“雕虫小技”。“父亲不顾当时社会和封建家庭的偏见去研究昆虫,说明他决心的坚定。”何燕生说。

“疟疾是当时对中国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之一。”何燕生解释说,1934年对海南岛考察时,何琦目睹了疟疾猖獗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这奠定了他为之奉献终身的使命。从此,他走遍大江南北,从青年时代直到生命之终结,百折不挠,一以贯之地深入研究疟疾。因为在何琦看来,疟疾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估计旧中国每年疟疾患者高达3000余万人。“在这个维系着3000万人生命的前提下,与这个疾患作斗争,成为父亲毕生的热情和奋斗之所在。”

孜孜科学人

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多学科性的

国际科学会议。何琦成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并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近年来中国的疟疾研究》。由于这篇论文极具重要性,被翻译成英、法、西三种语言。

这是对何琦在疟疾研究上的成果和孜孜以求的科研态度的充分肯定。作为科研工作者,最重要的科学素养是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何琦在防治海南岛疟疾中的不懈努力,就是这样一个好的案例。

何琦率领科研工作者,首先研究确定了微小按蚊是海南岛疟原虫的主要携带者,并通过7年的灭蚊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岛上这个主要传疟媒介。随即,又转入对巴拉巴按蚊的杀灭工作。

何琦曾做过“海南岛微小按蚊残存分布调查”和“海南岛微小按蚊残存分布继续调查”两篇总结,从中可以找到两章对比性的地图,1张是原来标志着微小按蚊存在的小黑点分布的海南岛地图;在经过抗疟运动后,变成了1张仅有零星数点的洁白地图。

由于防治疟疾成效显著,何琦所发表的《海南岛消灭微小按蚊及其防治疟疾的实际效果》科研报告,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何琦在海南岛与来访外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何琦在海南给学员讲课。

海南疟疾研究站同仁合影(何琦在坐排左六)。

防治疟疾的
“黄埔军校”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何琦教授一手创立的海南疟疾研究站,为全国的防治疟疾工作培养了大批人才,研究站被誉为我国培养抗疟技术人员的“黄埔军校”。

“解放后父亲致力于培养抗疟干部。”何琦的女儿何燕生说,海南疟疾研究站建站第一年就承办了两个防疟人员训练班,一个是高级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一个中班级,学员来自两广。到了1956年底,该站已在海口和兴隆举办了疟疾防治训练班6期,其中高级班3期、中级班2期、初级班1期,共培训了来自全国20个省份的疟疾防治专业人员350人。

1956年的某一期训练班有苏联代表团参加,卫生部防疫司司长和广东省卫生厅防疫局局长都参加了。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沙耶夫院士和何琦以及海南疟疾研究站的疟疾专家刘吟龙、任道性、盛伯梁、杨新史等教授共同授课。在卫生部和广东省卫生厅的支持下,训练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续举办,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的抗疟工作的领导骨干、技术骨干和基层干部。

在训练班上,何琦对学员和青年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多次讲话,敦敦教诲。“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到父亲对抗疟干部所寄予的殷切期望。”何燕生说,自己的父亲希望大家通过学习,不仅在业务知识上掌握抗疟工作所必需的整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更能建立起对抗疟工作的信心和感情,坚定抗疟意志。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何琦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培养学员的独立思考 and 独立工作能力。在培训学员的野外实习阶段,采取一种崭新的教学方法,就是放手让学员独立工作,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第二是强调人人要参加实际工作,要参加到行动的队伍中去。强调抗疟工作不能搬教条,不能关起门来作计划。只有自己参加到现场工作中去,才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本版图片均由何燕生提供)